

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

黄兴涛，杨念群

中华书局

目 录

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
(1840—1876)

前言	1
01 引言	1
02 资料概览	22
03 西方的中华帝国观	77
04 闭关自守的崩溃	91
05 移民	108
06 鸦片	120
07 商业和政治利益	139
08 中国社会	165
09 语言和文学	213
10 哲学和宗教	238
11 音乐和艺术	281
12 科学	296
13 结语	309
译后记	322

“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总序

二十余年前，当中国再度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钟叔河先生主编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旨在展示近代中国人最初步出国门后，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该丛书以深沉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内涵，给读书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温馨的记忆。那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出版工程。至今，我们仍然期待着它还能够有新的延续。

但是，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走向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人们还表现得更为“主动”，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当中国人远渡重洋，以惊奇的双眼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也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以及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留下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方面形形色色的观感、研究和评论。无论是从历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还是中国民族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角度来看，这些著述都不该是封存于库的资料，而是有待开发

的内容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虽然,在那中国人备受欺压的岁月里,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但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心的明智之作。作者或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为清廷所雇佣的外国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或是西方报刊派驻中国以及在华西文报刊的记者,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探险家、律师和到中国经商的商人等等,其角色种类之繁,观察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内容之细致深入,总体说来均非同时期有机会观察西方的中国人及其有关著作可比。正是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观察者所写下的为数众多的著作,从而建立起了当时的西方世界里关于中国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构成今日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历史底版,并反复不断地被现实冲洗出新的照片。

浏览西方人关于近代中国的各种著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记述,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点。相当一部分是对中西直接接触和中国基层社会的记录,多系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他们的眼睛里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因应着当时当地不同的现实需要,故此对于中国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左右、优先摄取或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盲点”——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借中国这壶“老酒”,去浇他们自己心中的

“块垒”。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所记所述、所议所论，也仍然具有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认识一个民族及其社会文化是一件复杂而长期的事情。无论是认识者还是被认识的对象，都会受到历史和现实因素的种种制约，且自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英国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就曾感慨，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及其文化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总在不断地变化着（参见本丛书中《中国变色龙》一书）。其实，并非只是中国自身在变，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知、想象，也在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改变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大体说来，西方世界形成比较明确的中国形象，约从13世纪中后期《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和《马可·波罗游记》等的出版和流行开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西方人眼中都是一个神秘而富庶的东方国度。至17世纪末和18世纪，沉醉在“中国文化热”氛围下的欧洲人，更是视中国为政治开明、教化理性、文明高超的效法榜样。然而从18世纪末期起，由于种种因缘，这一正面形象却迅速地朝其反面转化。

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叶，是西方中国观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也是本译丛所主要关注的历史时段。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像18世纪时那样美妙，令中国人揽镜自照之下爽心悦目之感油然而生，而是观之不免既惭且愤，并由此易生奋发图强、赶超雪耻之念。阅读那个屈辱时代西方有关中国的各种著述里常见的民族偏见和文化歧视时，我们其实已不必过于敏感，更不必有意加以回避。正如本丛书最早出版之时戴逸先生赐序所指出的：这些偏见和歧视，“只能昭显出作者的狭隘和时代的局限，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

一个雄据于东方，充满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民族，已经丝毫无损。我们已有足够的肚量，来回顾已为陈迹的一切”。

如今，中国人的“汉唐气魄”正在逐渐恢复，坦承近代西方那极不美妙的中国形象之中的有关认识总体上较之以往趋于深化，至少这种形象变化成为其认知中国走向深化所必经的一个重要阶段，大概不会太显唐突。因为毕竟，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要远比以前更为密切、交往更深、观察更细、碰撞也更多。实际上，我们怎样看待这一变化了的形象并非至关重要，最重要的在于，它是不以我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种曾影响中西交往且至今仍影响着这一交往的历史文化因子。大凡健全自信的民族，都不会不正视和研究这一历史现象的。

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好比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照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了解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变迁史，将无疑有助于我们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在国家建设和国际交往中，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借别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的意思。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有关中国著作的翻译，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对西方汉学家专门研究成果的译述，这已得到许多人的重视。其中影响最大的工程，乃刘东教授主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它向国人介绍了不少当代西方和日本一流的汉学研究论著，资为国内学者学术研究有益的借镜。而我们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则显然属于另一类。它主要选择 19 世纪中国国门被打开后，来华西人综合记述或具体描述中国城乡的社会经济

生活、各阶层的日常信仰行为、文化接触的故事、政治制度的运行等轻松活泼、凸显感性、不那么古板学究气的各类著述。我们的标准是：它们曾经在西方世界较广泛地流传，对西方的“中国观”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作者在华经历丰富、际遇独特、观察细腻、眼光独到、议论有味，总之具体真切、形象生动。与此同时，丛书还将包括一些后来的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于欧美“中国观”予以分析研究的总结性著述。我们认为，后一类译著的价值，当是前一类研究专著所无法取代的。

本译丛最早筹划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97年至1999年间，它曾以“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为名，由时事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先后推出过十种，受到学界和读书界的广泛重视和欢迎。但此后，终因我们精力不济，未能继续编译下去。多年来，虽屡有朋友鼓动、多家出版社诚恳相邀，我们却始终畏葸不前、未敢轻允。2004年底，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的李晨光、马燕、孙文颖等郑重来函，希望我们能将此套译丛改在中华书局出版，争取每年推出三至五种，持续不断地长期编译下去。书局的领导对此也很支持，意在使之成为一项有文化积累意义的“出版工程”。经多次商谈，我们终于又在这个文化人“情有独钟”的老牌出版社的召唤之下重鼓余勇，再次投身到此套译丛的编译事业中来。

由于原来所出版的十种书分散在两个出版社，且早已绝版，有的译校也尚欠精审，故此次在推出新译之前，在汉学编辑室上述几位专业编辑的大力协助之下，各译者又对原译著进行了认真的校审或修订，并首次以十部汇齐的完整形式，

将其予以重版。在方便读者的同时,也希望此举能为译丛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个较为牢靠的基础。

但愿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对于国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认知西方人当时的中国观,能够多有助益,并在今后“持之以恒”的坚持中,真正成为编者、译者、出版者和读者共同喜爱的学术文化事业。

黄兴涛 杨念群

2006年6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前 言

这部专著旨在阐述 1840 年到 1876 年间西方人士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1840 年爆发的第一次英中战争 (Anglo-Chinese War) 是中国历史,也是中西关系的转折点。这场战争结束了中国的与世隔绝和高傲自大。由于 1842 年中国部分地对外开放,欧洲人有了获取这个国家第一手资料的更多机会。1840 年也是西方人旧的中国观念瓦解和新的认识逐渐形成的转折点,这种新认识是由 19 世纪的零碎观念慢慢积累起来的。19 世纪 70 年代之前,有关中国的一般性描述著作表明,外国人对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看法有了更准确的资料,不再发表一些较为荒唐的言论。尽管在 1876 年之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有了明显的增进,但是,这个时间仍可以作为这项研究工作的公认界限,因为这之后欧洲人或者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并没有绝对性的变化。迄今为止,传教士们依然用颇为相似的方法持之以恒地继续着他们的工作。整个 19 世纪,贸易商和资本家增进了他们的在华利益。特别是随着帝国主义在英国和法国的复兴,西方的政治家、贸易家和商人认识到了在华投资和开辟市场的重要性。

这部专著不是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说明性研究。我的主要兴趣在于展示中国在西方思想中扮演的角色,阐明欧洲人对东

方人及其国家所持的观念。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正确与否同这项专题研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在后面的个案研究中,我还是引用了这方面的许多例证。

因此,这部专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资料摘录,其中包括了不少作者杂乱无章、荒诞不经的概括,也有许多精明睿智的传教士、学者、领事官员、游客的记录资料。想让我用引号来标明他们的观念是不可能的。这些观点在本著作中只是作了一般性的概括,而没有去直接引述,但是在本著作的注解和一般正文中,我都引用了这些叙述者的名字。

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采取了现实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方法。文中尽一切可能对每个讨论的题目作了时代性的阐述,力图揭示不同概念在同一时期的逐渐变化。追寻任何一个有关中国的正确观念在传播方面的进展是异常困难的,因为描述这一进展的作者们有不同的知识教养、生活背景、认识标准和利益关系。这部专著是部有趣的混合物。这当中,17世纪和18世纪的通俗性著作、表象性研究、偶然性记述和学术性研究、准确系统的资料记录等等,同时并存。

通过对文字资料的概览,我发现西方人从不同角度,尤其是从它的知识奇特之处,对中国怀有兴趣,在这些书籍和文章中,强调中国社会习俗的独特性和奇异性的内容占据了很大部分。不少西方人对中国的商业和产业生活投以关注,而传教士们则对中国的哲学和宗教情有独钟。

由于这一时期西方有关中国问题的文字材料出版得很多,所以我在资料的使用上进行一定的选择是绝对必要的。我已经阅读了不少普通的著述和游记。尽管我不能查阅全部的期刊和文献,但还是查看了许多主要的期刊杂志。我没有去翻阅

报纸,尽管它们给人们提供了西方与东方往来的船舶总量、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以及其他问题的丰富材料,但是它们极少报道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认识。尽管我没有去查阅这一时期的官方报纸,然而,有关记述政治家们在鸦片问题上所持观念的“英国议院议事录的议会辩论状”(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是一份重要的材料,《加利福尼亚立法杂志》(Journals of the California Legislature)也给我提供了有关美国对中国移民所持态度的资料。

我希望出版一部与本著作编纂在一起的有 4000 多个条目的著作目录^①。它将包括一般描述著作、游记、中国文献的译作、供西方学者使用的中文语法书籍和词典、刊登在一般期刊和学术出版物上的文章,还有从 1840 年到 1876 年间的各种文字材料。

本书的研究工作大部分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康奈尔大学华森资料中心、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埃塞克斯研究院进行的。我还在诸如哈佛大学贝克图书馆、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国会图书馆,以及教会研究图书馆、神学联合会图书馆一类的其他图书馆查阅了资料,对这些图书馆的全体工作人员,在此谨致谢忱。

我在已故威廉·R. 谢福德(William R. Shepherd)教授指导的研究班研习时已经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非常感谢他在本书的资料分类、大纲拟定上所给予的帮助。1934 年 6 月 7 日,谢福德教授去世之后,詹姆斯·T. 夏特威尔(James T. Shotwell)教授成了这项研究的指导者,我对夏特威尔教授的热情鼓

^① 因本书内容及注解已基本涉及这些条目,故书后不再附译这些目录。
译者注

励和宝贵批评意见表示感谢。我还要对莱登大学的杜文达克教授(J. T. L. Duyvendak)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汉语访问教授表示谢意,他们所提的批评和建议对这项研究工作的改进起了难以估价的作用。中文系的蓓克(C. H. Peake)教授在本书的内容和体裁上也提出了许多令我欣赏的很好的建议。

我也非常感谢英文系的阿瑟·克里斯蒂(Arthur Christy)博士,他阅读了本书初始阶段的部分材料,中文系的古德里奇(L. C. Goodrich)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参考阅览室的图书管理员玛姬(I. G. Mudge)小姐,还有国会图书馆的胡迈尔(A. W. Hummel)博士,对本书都曾提出了很有帮助的建议。

M. G. 马森

1938年6月20日

01 / 引 言

19 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水准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此前三个世纪的研究成就，因此将那一时期的中欧关系作一简短的概括，对于了解 1840 年到 1876 年期间西方人对中国的态度是最为重要的。通过 16、17、18 世纪的西方航海家、旅行家、传教士的活动，大量有关中国的新认识传到了欧洲。在这三个世纪中，耶稣会传教士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一道重要的了解桥梁，17 世纪后期，他们是西方了解中国的最高权威^①，18 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的著述和译作，使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达到了如此普及的程度，以至于可以略带夸张地说：“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他们对自己一些地方的了解。”^②

耶稣会传教士从自己的经验中认识到：在中国作谦卑和苦行的表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中国人的眼中，卑贱和寒酸并不意味着品行高洁。他们必须使自己适应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尔后才能在中国生存下去，他们甚至像中国人那样梳妆打扮自己，而其他在远东地区的宗教信徒们却严格地保留着他们在欧洲习以为常的风格，死板地遵循着他们禁欲主义的原则。

在外观上顺从中国习俗的同时，耶稣会传教士也竭力去领

悟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他们的信仰可以与儒教相调和，因为儒教与其说是宗教律令，倒不如说是一种道德教义，它与基督教的道德原则并不冲突。因此，耶稣会传教士是把中国古代的宗教当成与基督教义基本上一致的信仰而加以接收的。他们相信，这种信仰的一致性达到了对同一个上帝——基督教的上帝的崇拜程度。

比较困难的是把儒教的祖先崇拜与基督教调和起来。在这种对祖先崇拜的风俗压力下，传教士们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中国人也许会控告他们破坏了中国人那种建立在对家庭顺从基础上的社会秩序。耶稣会传教士不能阻止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他们试图证明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敬并不表现在对偶像的崇拜上，而是表现在对其精神的追念上。他们坚持认为，应当允许中国的基督教掺入祖先崇拜的成份，但是其他教派的传教士坚决反对这么做。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前期，基督徒们对中国“礼仪”的争吵达到了狂暴的程度。

耶稣会传教士们断言，与儒教和祖先崇拜相关的“礼仪”纯属礼节性行为，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竭力使教皇和欧洲的公众们相信他们观点的公正性。1742 年，这场争论彻底结束，教皇作出决定，坚决反对耶稣会传教士的主张。

尽管耶稣会的传教士没有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团中取得领导地位，但是，几乎直到 18 世纪末，他们一直垄断着传教出版物。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为了改变那些具有高度文化教养的中国人的信仰而经过仔细挑选出来的传教士都是些知名学者，其他教派的传教士们则受到他们的主教大人的警告，要与中国纯粹知识性的人或物划清界限^③。

因此，耶稣会传教士通过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成就，推

动了欧洲汉学研究的发展,曾德昭(Alvaro de Semedo,1585—1658)是一位较早的传教士,他的著作《中华帝国通史》(Histoire universelle du grand royaume de la Chine)于1642年第一次出版,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郭居静(Lazare Cattaneo,1560—1640)和费奇规(Gaspar Ferreira,1571—1647或1649)编纂了一些字典,但一直没有出版^④。

卫匡国(Martini,1614—1661)在1651年因为有关“礼仪”的争论,被在华传教组织遣回欧洲,他对西方汉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的巨作《中国新图》(Chinese Atlas)是有关“天朝上国”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最初由著名的出版商布劳(Blaeu)在阿姆斯特丹发行,后来又被译成了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出版。这位作者还写了一部重要的历史学著作,其中的一些部分被杜赫尔德(Du Halde)引用在他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一书中。由于这些著作的问世,卫匡国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显得十分重要,而且他对西方汉学的进展还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当他在阿姆斯特丹忙于出版他的《中国新图》时,莱登(Leyden)大学的阿拉伯语教授、后任数学教授并有一套整齐的中国藏书却不懂汉语的哥利乌斯(Golius,1596—1667)渴望能与他见上一面。在莱登,哥利乌斯匆匆拜会了卫匡国。卫匡国去罗马之前,他们又在安特卫普会晤。原本通过对阿拉伯语研究而对中国历法产生兴趣的哥利乌斯在这两次会晤期间,第一次发现由格雷维厄斯(Graevius)出版的、中世纪波斯人的“东域语”(Catayan)的词汇表与中国人的四季转换及历法序列完全一致,因此他认为“东域”(Catay)和“中国”(China)是一回事。第一次会面,卫匡国还给了哥利乌斯一些中文书籍和手稿。哥利乌斯回到莱登之后,写了本作为卫匡国

《中国新图》附录的著作《东方帝国附述》(De Regno Catayo Ad-ditamentum)。他在这部著作中介绍了同卫匡国会晤的情况,还使用了卫匡国留给他的那些资料。这部作品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里面有第一次在荷兰刊印的木刻汉字,这也许是在欧洲第一次出版汉字^⑤。

还有一部 17 世纪的著作,即克察(Athanasius Kircher)的《中华文物图志》(China Illustrata)(1667),由于它通俗易懂而影响极大,这里面有许多反映中国生活的图画。克察对西安府有名的碑文作了解释。这个解释已经在他的《埃及人的祖先》(Prodromus Coptus sive Aegyptiacus)(1636)中作过简述。克察对耶稣会传教士卜弥格(Boym)在这项研究工作中给予的帮助十分感激,因为后者向他提供了碑文内容的拉丁文译本和音译本,并给了他一部关于汉字构架方面的书籍^⑥。

荷兰籍耶稣会传教士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 1624—1676)与殷铎泽(Intorcetta, 1625—1696)、恩里格(Herdtricht, 1624—1684)合写了一部巨著《孔子哲学》(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该书由柏应理(Couplet, 1623—1694)负责编辑。1682年,他回到欧洲,对传教士在东方的活动作了报道,向教皇陈述了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礼仪的观点,并为他的传教团招募了一批新成员,同时,他还带回了许多手稿。他的这部著作在很长的时间内成了西方人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资料来源。鲁日满的另一部著作是《鞑靼—中国史》(Historia Tartaro—Sinica)(1673)^⑦。

居住在暹罗的贡·达恰德(Guy Tachard)和被路易十四派往东方的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张诚(Jean François Gerbillon)、白晋(Joachim Bouvet)、李明(Le Comte)、刘应(Claude de

Visdelou)等6名传教士于1688年2月7日到达北京。他们都有比较熟练的汉语知识,但是并没有留下对西方学者有帮助的汉语方面的论著。李明回到法国之后,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现状新志》(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的著作,这部著作由于它在有关中国“礼仪”方面的观点而值得一提。在卫方济(Noël)的同代传教士中,他是第一个翻译中国《孝经》的人。他的《中国哲学》(Philosophia Sinica)(1711)在那场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⑧。

考狄(Cordier)写道:语法和语言学家马若瑟(Prémare)、天文和历史学家宋君荣(Gaubil)是两位极有才干的传教士,他们的汉语知识无人能及。通过广泛的通信联系,他们对欧洲的汉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君荣直到1771年才出版了法译本《书经》,这本书比起他的天文学著作来,拥有更多的读者^⑨。

巴多明(Parrennin)在地理学领域作了广泛的研究。他在帝国图书馆(the Imperial Library)进行的有关地图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其中的许多错误。因此,康熙皇帝任命了一个由雷孝思(Regis)领导的、耶稣会传教士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来修改这些错误,从1708年到1715年,这个组织花了7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项工作。在这期间,雷孝思为了地图的准确性,在中国作了漫长的旅行考察,搜集了大量的地理学方面的资料,杜赫尔德把这些资料编进了他的《中华帝国全志》^⑩。其他一些在18世纪不太重要的传教士,有编写了一些辞书的佛罗伦·巴尔(Florian Bahr)、对傅尔蒙(Fourmont)的《汉语语法》(Grammatica Sinica)一书提出批评意见的富伦(Fourreau)、《诗经》的译者阿莱克塞德·迪拉·夏姆(Alexandre de La Charme)、德英卡维尔(d'Incarville)、德·维达卡(de Ventavon)和编辑辞书并对中国文